

世界 华文 文学研究

第四辑

SHIJIE
HUAWEN WENXUE
YANJIU

王晓初 朱文斌 主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第四辑

■ 王晓初 朱文斌 主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

SHIJIE HUAWEN WENXUE YANJIU DIS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四辑/王晓初、朱文斌主编.一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1110—386—1

I. 世... II. ①王... ②朱... III. 中文—文学研究—世界
—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0931 号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四辑)

王晓初 朱文斌 主编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联系 电 话	0551—5108468,5107719	开 本	787×1092 1/16
电子 信 箱	roseahbb@yahoo.com.cn	印 张	16.75
网 址	www.ahupress.com.cn	字 数	270 千
责 任 编 辑	刘 云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封 面 设 计	孟献辉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386—1

定价:22.8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　　言

由绍兴文理学院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至今已是出版第四辑了，其中的甘苦只有编者心里最清楚。寂寞里耕耘，不惮于前驱，为的是坚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一块阵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能走到今天，当然离不开我们学校领导及学科同仁们的鼎力支持，还有世界各地文友的认同与鼓励。在此，也只能以一个“谢”字来表达我们的心意了。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四辑的栏目设置基本上延续了前三辑的编排，有“学术视野”、“比较之窗”、“史海钩沉”、“理论阐释”、“文本解读”、“研究之研究”以及“学术争鸣”等。本辑“学术争鸣”栏目特别安排了现在台湾暨南大学任教的马华作家黄锦树的文章《国家、语言、民族：马华——民族文学史及其相关问题》。从题目上看，这是一篇关涉身份、语言、权力、公民权益、现代民族国家的暴力等问题的文章，有着“黄锦树独特思维”的痕迹。之所以将这篇文章安排在这个栏目，主要是冀望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进而可以和黄锦树深入探讨商榷，为马华文学的发展“辨名”和理清一些关键词。黄锦树是马华文坛的“急先锋”，早些年因为批判马华现实主义、掀起马华文学“经典”之争以及强调“去中国性”等，引发马华文坛“地震”。黄锦树的文章激进、偏颇之处显而易见，但确实有发人深省的地方。读者诸君读了我们选用的这篇文章之后，肯定有类似的感受。

“学术视野”栏目收录论文 2 篇，钟怡雯的《跨界之必要，书写之必要——从“旅行”到“旅行书写”》从“如何看待旅行，旅行如何形塑旅者”的后设讨论和“旅行和书写如何可能”的纠葛辨析两个方面对台湾新兴的“旅行文学”作了探讨，辩证地揭示了旅行与书写之间的关系，启发意义非常强，凸显了作者捕捉时代问题的敏锐性。颜敏的《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空间”纬度》认为“有关‘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与研究都离不开‘空间’纬度的指引”，针对“空间”纬度，她反思了研究者的研究范式、研究实效以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学科的合法性问题，视野开阔，具有相当的问题意识。

“比较之窗”栏目也收录了 2 篇文章，邓艮的《命名与误区：大陆外华文文

学》从“华文文学”的多种含混称谓出发,选择“大陆外华文文学”这一概念为突破口,批判了当前研究所存在的一些误区。孙超的《边缘的舞蹈——“留学生文学”与“新移民文学”华人女作家比较研究》以“留学生文学”与“新移民文学”这两大文学思潮的女性作家为考察对象,深入分析她们在“文化乡愁”、“寻根意识”、“人性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性,论证充分,逻辑性强。

“文本解读”栏目共收文章13篇,评述对象、涉及题材、切入角度,各不相同,显得多姿多彩。其中,黄维樑的《林行止“辩雕万物,智周宇宙”——“香港第一健笔”作品析评》、张贻婷的《幸福的黑暗——谢晓虹〈好黑〉的存在主义美学》、曹志伟的《用“复眼”解读亚洲近代史的序幕——陈舜臣长篇小说〈鸦片战争〉的文学史观》等论述的作家作品与其他几篇涉及的作家作品相比,也许读者并不十分熟悉,但透过几位作者的评述,我们大开眼界,仿佛享受了一顿格外“新鲜”的大餐。

“理论阐释”栏目所收的2篇文章非常有特色,杨书的《新时期中国“异国恋”文学中的他者形象》一文抓住“他者”作文章,论述了“异国恋”的种种不同形态,观察角度特别,有发人深省之处。赵冬梅的《小城小说:海峡两岸小说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以“小城”为着眼点,研究了大陆与台湾的小城小说的“地域特色”,并显示了小城小说是“认识时代的、社会的、民族的、作家的、文化的一个独特窗口”的作用。

“史海钩沉”栏目我们安排了2篇文章,马华著名作家陈大为的《独立初期的马华散文(1957—1969)》是一次对马华散文的断代史研究,资料翔实,论证深入,思辨性强。柯乔文的《五四中国与日治台湾的遭遇:作家作品的跨岸传播》梳理了五四时期中国大陆白话文运动对日治台湾的影响,从“殖民/被殖民的政治与社会脉络下观察”,突出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

“研究之研究”是对以往研究的一种总结和评述,这一辑还同前面三辑一样,我们也收录了2篇文章,张宁、倪金华的《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学界的“皇民文学”研究述评》和戴勇的《两岸琦君研究综述》都是史料扎实、梳理清晰的文章,能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照与借鉴意义。

粗略地谈了一些个人的感想,不一定正确,还是希望读者诸君自己去用心体会这些文章的奥妙之处。在此,还要向本辑作者们表示我们编者的敬意和谢意,希望以后还能得到你们的支持与关注!

朱文斌

2007年12月于绍兴风则江畔

目 录

前 言 朱文斌 (1)

学术视野

跨界之必要,书写之必要

——从“旅行”到“旅行书写” 钟怡雯 (1)

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空间”纬度 顾 敏 (13)

比较之窗

命名与误区:大陆外华文文学 邓 艮 (22)

边缘的舞蹈

——“留学生文学”与“新移民文学”华人女作家比较研究 孙 超 (29)

文本解读

林行止“辩雕万物,智周宇宙”

——“香江第一健笔”作品析评 黄维樑 (40)

时空纠结中的西比尔神话

——对也斯《玉杯》的文本细读 吴君 (57)

幸福的黑暗

——谢晓虹《好黑》的存在主义美学 张贻婷 (64)

风中摇曳的菊

——论李碧华《霸王别姬》中的菊仙形象 陈惠莲 (77)

传奇文本和都市隐喻

——从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谈起 陆雪琴 (87)

鹿港梦魇的追寻与突围

——论台湾女作家施叔青的早期创作 徐玲 (95)

迎风启航的双桅船

——试论李昂小说的性别意识 王亚男 (102)

从“伊甸”，到“风尘”

——朱天文创作的文学地景转变 李晨 (110)

植根故乡文化的吟唱

——琦君作品中的地理书写探析 尹诗 (126)

以散文之姿融戏剧之长

——张晓风散文之戏剧性探讨 茅林莺 (133)

用“复眼”解读亚洲近代史的序幕

——陈舜臣长篇小说《鸦片战争》的文学史观 曹志伟 (142)

论李安的华丽转身之作——《卧虎藏龙》 庄园 (152)

浓墨重彩巾帼侠气，离经叛道浪漫斗士

——《女勇士》之中国侠文化的运用及误读 刘江 (161)

理论阐释

- 新时期中国“异国恋”文学中的他者形象 杨书 (169)
 小城小说：海峡两岸小说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赵冬梅 (178)

史海钩沉

- 独立初期的马华散文(1957—1969) 陈大为 (187)
 五四中国与日治台湾的遭遇：作家作品的跨岸传播 柯乔文 (205)

研究之研究

- 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学界的“皇民文学”研究述评 张宁 倪金华 (221)
 两岸琦君研究综述 戴勇 (232)

学术争鸣

- 国家、语言、民族：马华
 ——民族文学史及其相关问题 黄锦树 (239)

跨界之必要，书写之必要

——从“旅行”到“旅行书写”

▶ 钟怡雯

要论述旅行书写，势必要先论述何谓“旅行”。先有旅行，方有旅行书写，然而旅行与旅行书写却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旅行与旅行书写是两件事，旅行书写是旅行的“不必然”结果。旅行书写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大盛，成为一个与饮食文学分庭抗礼的新兴主题，胡锦媛在《台湾当代旅行文学》一文中指出，旅行文学跟网络结合，成为“台湾当代发展得最为迅速广泛的文类，有评论家甚至宣称旅行文学为台湾当代的‘时代文学’”。^① 究竟是什么原因催化，或者鼓动了旅行书写的风潮？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它牵涉到文学与文学机制的运作，以及文类演变与发展的关系。旅行书写成为显学，跟 1997 年华航接连举办三年旅行文学奖有莫大的关系。华航旅行文学奖以首奖一万美金，以及两张来回世界任何航点的头等舱机票的优厚奖赏，让旅行书写跟旅行一样具有吸引力。1998 年，长荣航空举办第一届，同时也是唯一一届的长荣寰宇文学奖，跟华航互别锚头。这两届文学奖皆把旅行书写称为“旅行文学”，直接宣示它是一种“文学类型”。这两个奖项挟媒体的强势宣传，对旅行书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媒体时代，文学类型不是经由文学史缓慢的累积而成，而是经由“外力”，也就是媒体的操作而快速成形，虽然学界对“旅行文学”这个名词的使用打从一开始就抱持质疑的态度，就像质疑“饮食文学”一样，它们

^① 胡锦媛：《台湾当代旅行文学》，见陈大为、钟怡雯编《二十世纪台湾文学专题Ⅱ：创作类型与主题》，第 172 页，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6。

能够成为独立的文学类型吗？

从 1997 年的质疑开始，至今十年。十年后，旅行书写快速累积了一批为数可观的成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外交官夫人徐钟佩的《追忆西班牙》（1976）、《静静的伦敦》（1977）和《多少英伦旧事》（1980），以及同时期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1976）、《稻草人手记》（1977）、《哭泣的骆驼》（1977）、《温柔的夜》（1979），这些广为人知的异域书写，曾经风靡一时，特别是三毛，她以“流浪”的浪漫姿势代替读者完成他们的梦想，成功地塑造出“浪迹天涯的台湾奇女子”形象。

然而这两位的旅行书写均被置入散文的大类里，就像游记其实是余光中散文书写重要的一项成绩，从《左手的缪思》到《日不落家》，计有 46 篇之多，除了游记体之外，并有中国传统游记的论述 4 篇。从论述与创作并驾的书写策略，可见余光中试图透过知性的论述去思考游记的本质，而尝试在这两者相互沟通、相互影响之下建构游记的书写风格。^① 跟徐钟佩、三毛一样，他的游记亦淹没在散文的大项里，鲜被独立论述。这三位作者的例子足可说明，旅行书写作作为现代散文的一种类别，本以零星的形态存在，没有被创作者视为一个重要的“主题”。直到 2000 年以后，标榜以旅行为主题的“旅行文学”，而非旅行指南/导览大量出现，旅行的主题式书写才成为风潮。

2000 年因此是个值得考察的时间点，我认为跟华航和长荣所举办的旅行文学奖有密切的关系。文学奖促成旅行与文学的联结，引爆了积累的旅行书写能量。旅行文学被称为时髦的新兴文类，^②固然跟媒体和文学奖的操作有关，亦有其时代条件的里应外合。胡锦媛对旅行文学的观察是：“自九〇年代以来，经济力的提升、全球化的愿景、对异国的想象与紧张的生活压力，使旅行爆炸性地成为台湾全民生活的‘必要’，一种持续进行的集体仪式。旅行所激发出来的叙述欲望与全民书写能量在旅行写作中找到了最钟情的消耗空间。”^③ 台湾自 1979 年开放观光，经济起飞和全球化风潮下的观

^① 钟怡雯：《风景里的中国——余光中游记的一种读法》，见《无尽的追寻——当代散文的诠释与批评》，第 41—56 页，台北联合文学社，2004。

^② 舒国治在《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说：“‘旅行’，成为出版的一种门类。报纸及电视谈到旅行，如同是一时尚。”见《流浪集》，第 112 页，台北大块文化公司，2006。

^③ 胡锦媛：《台湾当代旅行文学》，见陈大为、钟怡雯编《二十世纪台湾文学专题Ⅱ：创作类型与主题》，第 171 页，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6。

光产业，其实是旅行书写的基矗。从观光到旅行，进而有旅行书写的可能，其实是一连串观看、反省、思考和批判的论述过程。论述旅行书写的当代或后现代的意义，就必须重新思考旅行的意义。因此本文第一节拟讨论当代台湾旅者如何看待旅行，旅行如何形塑旅者，实为旅行的后设计论。

旅行必然是身体的移动，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跨界经验。因此旅行不能只是心灵产物，而须有现实的经验和实践为基础。虽然如此，旅行书写能否等同于写实，在身体跨界的同时，能否同样在现实与想象之间跨界，旅行和书写如何可能，乃是第二节的讨论焦点。

一、旅行的后设辩证

我们带着我们的偏见去旅行，换而言之，没有一种旅行是客观的，主体带着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去旅行，读者阅读的不只是异地风景，尚包括旅者的观点/偏见，也就是旅者的“内心风景”。旅行最根本的意义乃在发现自我/他者的“差异”，因而产生内省和反思。以下所引旅行书写中关于自我/他者的讨论，或可说明这层关系：

波特认为旅行书写除了记录旅途的经验表象，更重要的是建构作者的自我主体(subjectivity)以及和他者(other)之间的对话交锋(a diologic encounter)。旅行者离家在外，跨入“他者”的地理与文化版图，产生一种追寻乌托邦的欲求。这种欲求兼含对本土现况的不满，以及对理想国(制度)的想象建构。虽然旅行书写以记录实证经验自诩，但是潜藏在旅行者心中的欲求却促使自我主体持续借由外在世界的刺激而生内省，思考“我”与“他者”的定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①

欲望乃是对应缺憾和幻想的满足而起，对现实的不满，对未来/远方的想象，乃有追寻乌托邦的欲求。这是旅行的最原始动机。舒国治便表示“旅途中变化无穷的景致，未必能转移你固执的视点而达至所谓的‘目不暇给’。看东看西一阵后，你总还是看回你自己、看回你心中一直还企盼的某一世

^① 宋美玲：《自我主体、阶级认同与国族建构——论迪福、菲尔定和包士威尔的旅行书》，载《中外文学》第16卷第4期。

界。倘你心中想的事不能由旅途中得见，眼虽不停顾盼，竟是视而不见”。^①这段论述以旅人的身份响应了波特的意见，旅行照见的不见得是异地风景，反而是旅人内心的偏执。跟“观光”不同，观光是一种走马看花的风景猎奇，或者购物消费的商业行为，早期台湾甫开放观光时，台湾观光客最为人诟病的，便是这种暴发户式的观光行径。

舒国治认为旅人看见的是自己的欲望，那欲望便是“乌托邦”，是心中所企盼的另一世界，换而言之，旅行是一种照见旅人“内心风景”的方式。正如余光中的旅行观感：“风景可以是一面镜子，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境由心造，未始照不出一点哲学来。”^②这段引文的体悟颇为接近精神分析大师拉康(Jacques Lacan)所说的镜像结构，透过他者/非自我，才能映照出自我。余光中的“风景镜子”之说可谓以旅行呼应拉康的理论。引文出自《山国雪乡》，写于1987年，余光中的“风景”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异域”，它召唤余光中的内在中国，内在中国同时又构成了他游记里最独特的风景。^③罗智成在《南方以南，沙中之沙》中反省撒哈拉和南极之旅时，发现自己性格并不适于旅行：“我不是那么冒险犯难，也不是那么刻苦耐劳。”^④沙漠和南极(他者)的作用在于让这位提倡旅行，同时也戮力旅行的诗人，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旅行的性格。

当代对旅行反思最深入者，当推“浪人”舒国治，他举终生以旅行作为职志的文人 Norman Douglas 为例，这位文人在垂老之年，竟想客死异乡意大利卡布里岛(Capri)。旅行到最后，驿站竟变成了家，作客他乡成了落叶归根，离与返的辩证消失，“但真正令人留在异地不走的，其实是一种糊涂的惰性，一股先天形成的游魂(wanderlust)血液”。^⑤下面这段文字来自长荣寰宇旅行文学奖的得奖感言，虽然说的是别人，实则舒国治以喻自己便是那无法安定的“游魂”：

^① 舒国治：《旅途中的女人》，《理想的下午》，第61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② 余光中：《隔水呼渡》，第183页，台北九歌出版社，1990。

^③ 钟怡雯：《风景里的中国——余光中游记的一种读法》，见《无尽的追寻——当代散文的诠释与批评》，第41—56页，台北联合文学社，2004。

^④ 罗智成：《游记修改了我对旅行的记忆》，《南方以南，沙中之沙》，第1页，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2。

^⑤ 舒国治：《惰性与游魂》，载《联合文学》1998年第9期。

有好些年，我在美国跑了不少地方。总有四十几个州，总跑过约十万哩。地阔天长，不知归路。睡过太多太多异地的车上，去了太多太多毫无来由的村镇。十多年后回想，仍然想不出一个道理我干嘛要在那些公路上让我的汽车滑行。^①

不同于一般人有目的地、有明确目标的旅行，舒国治的漂泊其实更接近流浪，或者晃荡，他的《理想的下午》副标是“关于旅行也关于晃荡”，而《流浪集》则是“也及走路、喝茶与睡觉”，旅行便是流浪，亦是生活本身。他比“为了梦中的橄榄树”的三毛更具浪迹飘移的性格，甚至连青年时光也一并在飘荡中送走。^② 异域成了空间“概念”，而非实存的空间“地理”，旅行跟生活成为一体，身体跟空间互动合而为一：

流浪，本是坚壁清野；是以变动的空间换取眼界的开阔震荡，以长久的时间换取终至平静空淡的心境。……这时的旅行，只是移动而已。至此境地，哪里皆是好的，哪里都能待得，也哪里都可随时离开，无所谓必须留恋之乡矣。^③

旅行塑造旅者的主体性，“此处”(Here)跟“彼处”(There)的界线泯灭了，空间失去意义，旅行甚至让主体变成“主体就是旅行、旅行就是主体”。《理想的下午》跟《流浪集》二书因此流露“定居”亦是“流浪”的况味，旅行的意义可以是心灵的漫游、身体的放松，不一定要远走他乡。他甚至为台湾人的旅行另起新意：“我们人人在牌桌上、在榕树下、在无数的咖啡馆及泡沫红茶店里漫游。这在西方国家不容易看到。”^④ 舒国治对生活的观点完全来自对旅行的体悟，借由生活而延伸旅行的意义，在生活中寻找旅行，在旅行中寻找生活。

郝誉翔在他的新作《一瞬之梦：我的中国纪行》中说：“老实说，我也不知

^{①④} 舒国治：《漫无根由的旅行者》，《理想的下午》，第120—121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② 舒国治《路漫漫兮心不归》论述这类恒在旅途之人，“若在路途太久，久到不急着奔赴一处目的地时，往往不免进入飘荡的情境。这是颇危险的。所谓危险是指对人生的态度而言。……这样的生活过下去，一个不好，青年时光就这么全在飘荡中滑失了”。见《流浪集》，第41页，台北大块文化公司，2006。

^③ 舒国治：《流浪的艺术》，《流浪集》，第70页，台北大块文化公司，2006。

道为什么这些年来,会一直不断地东奔西走,有时,并没有任何的目的,单纯只是为了想走,而走。”^①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旅行在多次的实践之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一如钟文音说:“长期旅行反而贴近生活,我时时有生活在别处忽远忽近的心情在作祟着自己于异旅的状态。”^②旅行被一再操练之后,新奇感逐渐消耗,于是旅行成了旅行本身,再无其他。

后现代社会泯灭了居住和旅行的意义。李鸿琼在《空间、旅行、后现代:波西亚与海德格》论及居住和旅行时,特别讨论海德格“居住”的观点:

Heidegger 对现代科技的批评基本上是强调居住的不可能,因为科技使人无法再接触传统因而变成无根的存在。……“失去灵气的城市”使得地方归属感不再存在,而观光或当代旅行可能就是为了要逃离这种文化的无根状态。但是在逃离和收编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越来越难居住或越来越禁锢的现实产生了逃离之社会的延伸,因为旅行早就已经是事先经过科技结构化或规划的了。但每一次的逃离或寻求自由的失败都唤起下一次的逃离,也都再次经历收编或失败的命运。^③

这段引文指出,在全球化和科技时代,旅行成为一种经验复制,于是地点不重要了,因为每一次的离开都无法免于结构性的重复。当代的台湾旅者因为频频旅行,改写了旅行的意义,旅行不再是冒险犯难,而是在网络无国界的符号世界里,在“无国境世代”^④,借由肉身的移动而确认/发现存在的意义,跟钟文音、郝誉翔同辈的王盛弘也说:

我在国外,很少想家,大约在台北也是一个人过惯了日子,久而久之,就像于伦敦雀儿喜药草园发现的一簇西班牙菠萝,挂在枯树上,吸收空中水汽即可存活,没有根,已经不需要根,在这里在那里,在此方在彼方,无处不能生长。^⑤

南方朔在为王盛弘的《慢慢走》作序时便表示,文明开创型旅行家的时

^① 郝誉翔:《一瞬之梦:我的中国纪行》,第 248 页,台北高宝国际出版集团,2007。

^② 钟文音:《情人的城市》,第 306 页,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③ 李鸿琼,《空间、旅行、后现代:波西亚与海德格》,载《中外文学》1997 年第 9 期。

^④ 借用黄宝莲的书名。黄宝莲:《无国境世代》,台北九歌出版社,2004。

^⑤ 王盛弘:《慢慢走》,第 61 页,台北二鱼文化有限公司,2006。

代已一去不返，当代的旅人多半把旅行视为“自我精神修炼之旅”。^① 王盛弘的欧洲之旅的“精神修炼”乃是确立自己属于“无根”世代，网络时代/世代有一半是活在虚拟空间里，网络改写了旅行的意义，跨界的冲击感降到最低，只要有网络，就没有太多的他方可言。黄宝莲亦认为网络让出发缺乏新鲜感，“行李安放客厅，静待主人出门，护照车票钱包钥匙，该带的要带，该放的都应该放下！来去如此寻常。这年岁，都没了离愁和相思，也是 E-mail 无远弗及”。^②

人类学学者利瓦伊·史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一开头就说：“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我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欲追寻的真理，只有在那真理本身和追寻过程的废料分别开来以后，才能显出价值”。^③ 利瓦伊·史特劳斯还抱怨旅行的受苦和寂寞。那是 1955 年或以前的现代，而利瓦伊·史特劳斯前往之地仍是前现代的蛮荒之地，吃苦和寂寞是旅行的必然，他大概无法像布什亚(Jean Baudrillard)那样，让旅行充满后现代的思考，寻找“意义的消灭”，^④ 亦无法像舒国治那样，享受流浪的冷艺术：“我们假设他有他自己的主体，例如他的‘不断移动’是其主体，任何事能助于此主体的，他做；而任何事不能太和主体相干的，便不沉沦从事。……这种流浪，显然，是冷的艺术。”^⑤

所讲“冷的艺术”，跟布什亚所提倡的，旅行是一种“朝向不归的目标”颇为相似，旅行只是移动，一种消失，布什亚的旅行亦可视为“后现代旅行理论”：

而决定性的片刻便在猛然意识到旅程没有终点、旅程不再有理由非要到达某一个目的地不可。超越了某一界点，即变成移动自身在变化。原本依自己的意欲而在空间移位的运动，变成被空间本身所吸纳——不再抗拒，不再有旅行特有的景象。^⑥

主体成了“不断移动”本身，景象并非旅行的目的，甚至没有目的。跟以

^① 南方朔：《一个有风格底作家的诞生》，见王盛弘《慢慢走》，第 27 页，台北二鱼文化有限公司，2006。

^② 黄宝莲：《未竟之蓝》，第 8 页，台北圆神出版事业公司，2001。

^③ 利瓦伊·史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第 1—2 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④⑤} 尚·布什亚：《美国》，吴昌杰译，第 13 页，台北时报出版社，2003。

^⑤ 舒国治：《流浪的艺术》，《流浪集》，第 60 页，台北大块文化公司，2006。

开疆和殖民为目的的大旅行时代相比,旅行的意义可以说被彻底翻转。黄宝莲甚至认为,旅行是一种消失,“如果我迷路、失踪,甚至消失在地球上,自己大概也不知道原因”。^①这种一心向往远方的“游魂”,没有目的,只为了消失和移动,是与生俱来的骚动和不安。舒国治便劝人不要太快回家。“夜里睡在不甚干净的稻草堆上……想想不必睡在铺了床单的床上,是多么像儿童的梦一样令人雀跃啊”。^②要而言之,流浪对舒国治而言有种重返(童年)乌托邦的意义、游玩的意义,纯为消磨时间的不务正业之举,“游山玩水,于我固为探奇,也为延时消日徜徉不归。愈得专心于形势之奇风坛之美,愈得以流连忘返,将人事肩担之愧索性抛却”,^③因此旅行是生命的一部分,为了彰显生命的波折和流动。就像在一篇名为《早上五点》的散文里,舒国治说早上五点,他从未在床上,虽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地要去,却总是人在屋外行走,总是在旅途中。因此舒国治的旅行认知,比较接近张让所说的,“旅行终极的意义不过是一种心境。读书、看电影、散步的愉悦,无非也是精神上的旅行”,“旅行是由每天的现实中转过一个弯,气定神闲,从另一个角度回视”。^④

诚如本节一开始就点明的,旅行主体带着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去旅行,我们阅读的不仅是异地风景,也包括旅者的观点/偏见,舒国治把当代旅者定义为“不断移动的主体”,黄宝莲认为旅行是一种消失。在全球化的后现代,跨界的距离缩短了,连旅行的意义也快被耗尽,风景内化成旅人的“内心风景”,旅行的后设思考因此变得格外重要。我们阅读的,其实是旅者对旅行的思考和批判。

二、旅行与书写的纠葛

詹宏志在《硬派旅行文学》中这样论述他期待的“旅行文学”:

^① 黄宝莲:《未竟之蓝》,第5页,台北圆神出版事业公司,2001。

^② 舒国治:《散漫的旅行》,《理想的下午》,第161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

^③ 舒国治:《北方山水》,《流浪集》,第49页,台北大块文化公司,2006。

^④ 张让:《旅人的眼睛》,见钟怡雯、陈大为编《天下散文选Ⅱ》,第168页,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1。

那里头有一种沧桑世故的味道，也许他所见的世界已多，奇景妙观未必能引起他的赞叹，他的身影走在一般人不易也不愿行走之地，因而显得特别巨大或渺小。他的作品本身应当是纪实的，不错，这正是旅行文学的根本，不然岂不是变成了《格列弗游记》？或者成了漫天大谎的《福尔摩哈》？作品也应有经验转化成思考的层面，不然和公式的船长日记或飞行记录又何以别？^①

这段文字把旅行文学定义成“纪实”和“经验转化的思考”，换而言之，詹宏志要求旅行文学必然有出发/抵达的过程，不能是虚拟实境或想象之作；同时借由书写，旅者转化了他的旅行经验，因此毋宁说，詹宏志期待的是一种旅者的观点：景物不是最重要的，他希望透过旅人的眼睛，看旅人看到了什么，怎么看。在旅行书写里，“旅行”是一种生活经验，最终仍要回到文字里被检视和阅读。旅行书写必须建立在丰富的旅行经验和感受上，而非旅行地点的异时空体验。罗智成也有相似的见解，他在《南方以南，沙中之沙》的序中提到，如果游记一味着重于异时空体验之“趣味”、“新奇”与“特异”等元素，无乃扩大文化差距、强化偏见。^②

胡锦媛对旅行与书写的关系，则有以下的见解：“我个人主张旅行是跨越疆界的行为，旅行写作者在离开旅行地点的‘直接现场’后，来到写作的‘间接现场’，以文字再现旅行行为，表达跨越疆界的‘行动’。”^③既然旅行写作是再现“旅行”，便牵涉到记忆与写作两个问题。记忆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却是个开放的符号系统，本质上即非透明，也非中性的：语言的透明性在实证或经验上早已被否定，因为语言无法仿真，语言只能表意。而且语言在表意的时候，必须借助其物质形式，即口说或书写，这些物质形式造成语言变动不居的状态，也使得符意浮动不稳”，^④以文字再现旅行，因此必然不可能纪实，必然会落入罗智成所谓的“游记修改了我对旅行的记忆”：

^① 詹宏志：《硬派的旅行文学》，载《联合文学》1998年第9期。

^② 罗智成：《游记修改了我对旅行的记忆》，《南方以南，沙中之沙》，第Ⅰ—Ⅱ页，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2。

^③ 胡锦媛：《远足离家，迷路回家》，见胡锦媛编《台湾当代旅行文选》，第9页，台北二鱼文化有限公司，2004。

^④ 李有成：《自传与文学系统》，《在理论的年代》，第47页，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6。